

#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主持晋衔仪

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

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 鼓励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治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发挥新就业群体特点优势,调动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8400万人,既是保障民生的生力军,也蕴藏着参与基层治理的巨大潜能。更好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课题。

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治理,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和独特优势。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工作时长、活动范围广、接触场景多,天然具备“移动探头”功能。与传统基层治理依靠专职网格员存在时空盲区不同,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轨迹覆盖城市毛细血管,能及时发现路面破损、安全隐患等动态问题,成为城市运行监测的天然补充。其参与城市治理能有效降低信息采集成本、提升响应速度,推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变。各地实践表明,当骑手成为信息采集员、安全巡查员时,基层治理触角得以延伸,问题处置时滞显著缩短。激活新就业群体的治理潜能,有助于补上基层治理力量短板,增强其职业认同感与社会归属感,推动其从城市“过客”变为“主人”。

更好地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关键在于畅通参与渠道、强化组织动员等层面入手。

以机制创新畅通参与渠道。新就业群体信息触角多,能弥补固定网格员盲区。例如,辽宁省阜新市推行“移动网格员”模式,300名快递员通过“阜政通”平台即时上报问题,实现闭环处置。河南固始县实施“红领新锋”工程,将新就业群体嵌入“一村(格)一警”体系,通过微信群秒达响应。又如,江西省南昌市聘任220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构建“骑手吹哨、部门响应”的新模式。实践证明,打通制度通道,新就业群体的“移动探头”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党建引领强化组织动员。新就业群体构成复杂、人员流动快,单靠市场或社会力量难以有效组织起来。因此,须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劳动用工逐步规范,从业环境显著改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各地依托快递站点、司机驿站、平台网点等阵地,采取单独建、联合建等方式织密党组织网络,推动党员骑手亮身份、作表率。实践证明,组织建起来、党员带起来、激励实起来,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才能从零散自发走向常态自觉。

管理好新就业群体的背后,是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变。在完善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有序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运行监测、公共安全预警等事务,在制度设计、参与渠道、激励保障上持续用力。当穿行于街巷的快递小哥成为政策宣传员、安全巡查员,城市治理就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将更有温度、更具韧性。(经济日报)

## 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事业观上的集中体现,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回望百年党史,老一辈共产党人用生命与热血、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份份堪称典范的政绩答卷。

### 以民为本:政绩观的“定盘星”

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明确提出:“得真心实意地群众谋利益”,“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指出,苏维埃工作人员必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这一价值立场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以贯之。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同志还批评“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的现象,强调“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党的七大将这一宗旨首次明确写入党章。

政绩是什么?是群众得了多少实惠,日子过得好不好。在入党那一天,每一名共产党员都会对着党旗许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庄严承诺。但如何做到始终如一坚守诺言呢?

周恩来同志说:“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50多年革命生涯,26载总理重任,周恩来把个人置之度外。“三更将眠五更起”,是他的日常。有一次,他到大庆各处视察工作,听完汇报已是凌晨一点半,他又来到大庆展览馆观看油田模型和技术革新展品。凌晨两点十

分,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劝他休息。他说:“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

### 实事求是:政绩观的“压舱石”

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强调:“拿事实来说话”,“从实际出发”,“照辩证法办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党员干部“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料,做到重要情况心中有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的实践,是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生动体现。1962年,焦裕禄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肆虐的兰考,没有选择急功近利的“面子工程”,而是走遍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跋涉2500多公里路,顶狂风查风口、冒暴雨探水势、尝盐碱辨土质,用自行车和铁脚板丈量出治理“三害”的精准方案,总结出“贴膏药”“扎针”等治沙良法。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写下的《我的修养要则》中,同样强调“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他将“习作合一”刻进工作日常,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深耕调查研究,以“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的严谨作风,创造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不朽实绩。

### 久久为功:政绩观的“度量衡”

老一辈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坚实之处,正在于其不贪一时之功、甘为后人铺路的境界与担当。

谷文昌同志是“潜绩”重于“显绩”的典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担任福建东山县委书记,面对“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的极端恶劣环境,立下“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他带领群众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把一个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生机盎然的绿洲。昔日东山森林覆盖率仅0.12%,今日森林覆盖率超过

94%,被誉为“东海绿洲”。谷文昌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几十年来,东山百姓逢年过节“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足以看出一位共产党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杨善洲同志同样以毕生之力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1988年退休后,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毅然走进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2年,将5.6万亩荒山变为价值3亿元的绿洲,并无偿上交给国家。有人不解地问他:“你这样做,到底图什么?”杨善洲回答:“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誓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够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并非为一时的政绩光环,而是为解决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富。

### 廉洁自律:干实事的“防火墙”

政绩不仅要问“为谁而树”,还要看“如何而树”。创业过程是否透明、权力行使是否规范,同样是衡量政绩成色的重要维度。

焦裕禄同志始终坚守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原则,从严治家、公私分明。渔场为给他补身体送来活鱼,他当即让子女送还集体;女儿想找轻松工作,他坚决拒绝,坚持送女儿到食品加工厂最艰苦的酱菜组当临时工;儿子借身份“看白戏”,他不仅严厉批评、当场补票,还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并建议起草《干部十不准》。

谷文昌同志同样将廉洁视为领导干部挺直腰杆、取信于民的基石。他曾说:“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我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在公私界限上泾渭分明,这种自我要求源于他对党群关系的深刻认知——“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

这种深厚的政绩品格不是靠响亮的口号堆砌而成,而是靠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实干一笔一笔书写出来的。民心所向,就是共产党人最光荣的政绩。(中国组织人事报)

